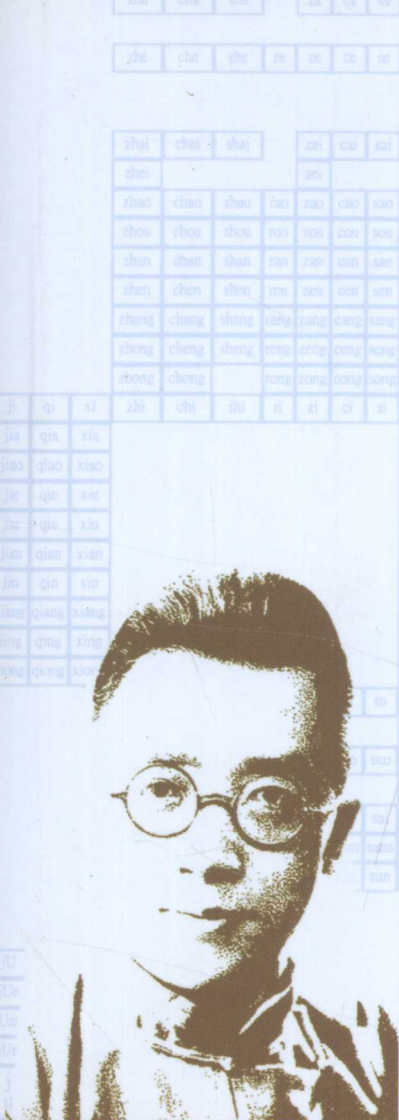


吴晓峰/著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darin Movement and
Literary Revolution



发生在近现代文化转型期的语文变革是中国现代性追求的重要一步，它们不仅完成了语言和文学自身的蜕变，实现了传统语言文学向现代语言文学的转型，而且成为了整个文化现代性追求的起点和先导。因此，研究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互动关系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汉语、新文学、新文化以及现代性追求的历史发展进程，也能提供思考和解决语言文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darin Movement and
Literary Revolution

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

吴晓峰/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吴晓峰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80211-790-7

I. 国...

II. 吴...

III. 国语-汉字改革-关系-新文学运动(五四)-研究-民国

IV. H125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4505 号

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高立志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236 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66(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1.25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序 言

晓峰的博士论文经过认真修改后要出版了，我们都有一种收获的感觉。她嘱我写序，我愉快地答应了。2001年入学的时候，她在当年文艺学博士生中是最小的一位，看起来像个小姑娘。慢慢熟悉之后，我的印象改变了，觉得她比实际年龄更为稳重、成熟。她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到硕士，上的都是名牌学校，基础相当扎实，整体文化素质好。她学习勤奋刻苦、为人正直谦逊，善于同人相处。在我眼里，在许多老师和同学眼里，她是个好学生。但从一个好学生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科研能力的博士，成为一个年轻的学者，还需要不断磨炼，还需要有一个艰苦努力的过程。三年的博士生学习过程，她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并且取得了成功。

长期以来文艺学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大多偏重文学，很少选择与语言相关的论题。晓峰却以《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互动关系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她对同语言相关的论题情有独钟，固然同家学有关，从小受到研究语言的父亲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她深刻认识到语言对文学的重要性，语言研究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性，特别是20世纪“语言学转向”对文学研究的重要

性。尽管博士论文选题有相当大的难度，但她的选择正体现了年轻学者的学术眼光和学术勇气，也博得了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们的一致肯定和赞扬，认为这是一个独特的、让人眼前一亮的选题。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和语言的关系，五四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关系，虽然也被关注，但长期以来缺乏从创作实践的角度、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从文学创作实践的角度看，五四以来许多文学大师都有深厚的语言功底，他们个个精通古文，外语也相当了得，这是他们的创作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再看看文革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他们开始靠文革年代的生活积累和改革开放年代的思想滋润，很快崭露头角，可是不少人因为缺乏深厚的语言功底和文学修养，很快就止步不前了。这种现象是很值得深思的。从文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以往的文学史对新文学运动的研究，虽然也注意到了语言革新问题，但常常只是一带而过，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和探讨。而实际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五四文学革命从根本上说是语言的革命。当然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关系，并不完全等于文学和语言的关系，但是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互动关系的研究，不仅对于研究五四新文学运动至关重要，是研究新文学运动的一条合乎学术内在理路的正途，对于从史论结合的角度深入思考文学和语言关系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文从历史、个案、理论三个角度，深入细致地考察了1917—1921年期间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联合的历史必然性、两大运动互动的方式和成果，以及两大运动对于现代文化转型的意义。总的来看，论文材料丰富扎实，论述清晰充分，而且整体结

构安排合理，这一切保证论文成功地达到预期的目标，具有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其中，努力再现历史原貌的历史感和强调实证的科学精神，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首先是历史感。五四前后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作者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通过艰苦的历史考察，力争回到历史现场，再现历史的原貌。在论证两大运动联合的历史必然性时，没有将问题简单化，而是努力揭示两大运动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对话关系，两大运动从独立到联合、在联合中保持相对独立的复杂关系。这样，理论问题通过历史的研究而呈现出复杂、生动、鲜活的历史内容，也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理论问题的认识。理论的研究，文艺学的研究，一直存在两种做法。一种叫“以论带史”，有的甚至发展到“以论代史”，拿理论当标签去套历史的事实，去宰割历史，其结果只能把理论简单化、庸俗化，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另一种做法叫“论从史出”，不是先下结论，然后再拿历史事实来套，而是从历史事实出发，从历史事实中寻找规律。这种做法认为理论是从历史中产生的，历史是理论产生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回归历史，才能对理论产生的历史语境、理论丰富的历史内容和价值有深刻的认识。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正道。晓峰走的就是这条正道。

其次是实证的科学精神。论文下了很大功夫对理论和实践四大个案进行相当细致、深入的分析。其中，论文通过对鲁迅创作实践的分析，通过对中国现代第一部真正意义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文本分析，阐明鲁迅如何将各种语言要素熔炼出新的白话文本，显示出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联合的最高的重要成果，不仅展示了国语文学的魅力，而且深化了以文学途径建设国语的理

论。而通过四种有代表性的国语文教科书的选材和编排的分析深入阐明国语文教科书对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成果的吸收和整合,以及如何从制度层面上确立两大运动结合所产生的新的语言传统和文学传统。论文这些个案的研究是一件需要下很大苦功夫的、十分艰难和繁杂的工作,需要有一种实证的科学精神。这种研究避免了飘浮和空泛,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这是论文取得成功的基础和保证。正是所有这些实证分析、有力地证实了两大运动互动的历史必然性和取得的突出成果,说明了两大运动及其联合不是某个人的理论设想,而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对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事实。

论文在实证的研究和历史的研究的基础上,也试图对一些理论问题做一些深层的探讨,如将两大运动的联合看作是文化转型的现代工程的一种表现,如从跨世纪的角度对文学和语言的关系做更深入的理论思考。这些更为宏观的更为深入的理论问题的探讨无法在论文中得到解决,但作者的关注和思考是值得肯定的。

晓峰是我学生中最年轻的一个。这篇博士论文是她学术道路的起点。毕业后,她成家立业了,她面前是事业和家庭两副重担。她面前的道路是宽阔的又是艰辛的。我祝她走好!

程正民

2008年9月14日

目 录

Contents

序 言	程正民/1
绪 论	1
第一章 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互动关系的历史研究	21
第一节 自由开放的时代氛围	21
第二节 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历史演进	30
一、从早期音标文字运动到国语运动	31
二、从早期白话文运动到文学革命	42
三、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联合	52
四、联合时期的三次重要论争	56
附录：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纪年表（1915—1921） ...	73
第三节 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联合的历史必然	76
一、共同点	77
二、分殊点	86
第二章 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互动关系的个案研究	101
第一节 理论个案一：胡适的“十字纲领”	102
一、“文学”和“国语的文学”	104
二、“国语”和“文学的国语”	115
第二节 理论个案二：钱玄同的语文改革理论	129
一、“音本位”的原则：文字改革理论	132

二、“统一”的辩证法：语言改革理论	143
第三节 实践个案一：鲁迅的《狂人日记》	156
一、文本的语言学分析	159
二、文本的超语言学分析	174
三、文本形式的意义	183
第四节 实践个案二：四种国语文教科书	195
一、早期国语文教学改革推进	198
二、国语文教科书的选材和编排	208
第三章 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互动关系的理论研究	225
第一节 国语运动对新文学的影响	228
一、对新文学文体的影响	229
二、对新文学主体的影响	245
三、对新文学研究的影响	251
第二节 文学革命对国语的影响	258
一、对整合语言要素的影响	260
二、对建构语言体系的影响	269
三、对更新语言意识的影响	283
第三节 语文变革对文化转型的影响	294
一、语文变革影响文化转型的意识	299
二、语文变革影响文化转型的途径	305
三、语文变革影响文化转型的结果	315
余 论	326
参考文献	332
后 记	339

绪 论

发生在近现代文化转型期的语文变革是中国现代性追求的重要一步，它不仅完成了语言和文学自身的蜕变，实现了传统语言文学向现代语言文学的转型，而且成为了整个文化现代性追求的起点和先导。因此，研究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互动关系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汉语、新文学、新文化以及现代性追求的历史发展进程，也能提供思考和解决语言文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思路和方法。除此之外，从“语言和文学的关系”这一古老的论题出发，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互动关系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实证意义。

理论上说，文学和语言的关系研究可以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静态的，一种是动态的。以往对“文学语言”的研究主要是一种静态的研究，它关注的是文学语言区别于日常语言、科学语言而具有的审美性问题。西方二十世纪“语言论转向”中的很多文学理论也是静态研究的结果，它们关注的是语言和文学研究方法上的共享性，特别是语言学研究方法对文学研究的辐射。这两类研究关注点虽然不同，但研究对象都是文学和语言的静态产品——作品或者方法。而且，稍加辨析就会发现，这类研

究虽然名为文学研究，但都是以语言学为立足点，是语言学研究的分支或延伸。因为，在语言和文学的关系中它们突出的是语言的核心或主导地位。因此在静态研究之外，还可以也应该建立一种动态研究。语言和文学是历史的发展物，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常常以鲜明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动态关系是理论研究应该注意的。从理论研究视角出发对语言和文学的动态关系加以考察，应当有别于文学史研究和语言史研究，这意味着研究中必须始终贯穿一种理论的思考——语言的变革在文学及其发展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反之，文学的变革在语言的发展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当然，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并非互不关联。首先，静态研究的历史较长，有很多认识和结论是动态研究可以运用和借鉴的。其次，动态研究的结果，需与静态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由此揭示出文学和语言关系的最基本规律。因此，动态研究既要借鉴静态研究的成果，又要开拓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史论互补揭示出文学和语言基本关系的更多内涵。

从动态研究的角度来看，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关系作为大家比较熟悉并且具有典型性的个案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现当代关于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关系的思考，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文学语言变革过程中倡导者的理论主张；二是后人反思现代文学、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化的认识。它们共同构成本论题的历史研究文献。

最早关注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关系的是运动的经历者和见证者。他们从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实践出发，对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随着研究的深入，后来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关系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研究。

者。胡玉缙是第一个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关联起来的^①，但他是站在反对国语运动的立场上，“揭露”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的默契关系。最早对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联合持肯定态度的是胡适。作为文学革命的首倡者，胡适认为文学的变革必须从形式入手，所以非常关注文学工具即语言问题。这种认识在他最早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已透露出来，后来的系列文章也都贯穿了这一思想。另外，与胡适唱和文学革命的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等，虽然认为文学革命在语言文字改革基础上还必须继续向前推进，将之发展为思想革命，但都肯定文字革命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20年代初，文学革命已经向思想革命深入，但文学革命所肩负的建设国语的任务仍然没有被人们所忽略。例如沈雁冰指出，新文学带有“国语文学的性质”，文学革命“最初的成功一定是文学的国语”^②；成仿吾也明确提出“对于国语的使命”是新文学的三大使命之一，并且称“我们的新文学运动，自从爆发以来，即是一个国语的运动”^③。由此可见，文学革命从一开始就把语言的变革和建设视为自身重要和首要的组成部

① 1916年国语研究会成立。1917年元旦，《新青年》2卷5号出版，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紧接着一期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3月份，胡玉缙敏感地意识到二者主张上的相近，指出“公等日日在中国，日日以国文为仇乎，岂惑于某氏文学革命之说乎”（胡玉缙《今之所谓教育家之供词》，《北京日报》1917年3月28日）。这是现代学者第一次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联系起来。

② 沈雁冰：《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46页。

③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76页。

分。而在国语运动方面，黎锦熙 1920 年提出的“七层宝塔说”，同样把“新文学的倡导”看作国语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①。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这种相互关注，势必走向一种自觉的联合。1921 年，胡适提出“国语文学的时期”和“联合时期”就是对国语运动当时的形势和未来走向的描述。

除了亲历者和倡导者外，作为见证者的陈子展、王哲甫在写新文学史时，无一例外地把国语教育或国语运动视作文学革命的重要起因之一。例如，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将文学革命的原因归纳为四点：文学发展上的新形势、外来文学的刺激、思想革命的影响、国语教育的需要；而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也将新文学运动兴起的原因分为“近因”和“远因”，其中“国语运动”是四大“近因”之一。

综上所述，早期论述者——或者来自文学革命，或者来自国语运动，或者反对语文变革，或者主张语文变革，或者在实践中推动二者联合，或者在研究中叙述二者关系——都清楚地看到了两个运动合流的现实，他们指出：（1）国语运动是文学革命的起因之一（陈子展、王哲甫）；（2）倡导新文学是国语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黎锦熙、胡适）；（3）文学革命负有建设国语的使命（胡适、钱玄同、周作人、沈雁冰、成仿吾）；（4）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出现联合趋势（胡玉缙、胡适）。这些论述对于今天

① 黎锦熙：1920 年 10 月 14 日在杭州发表演讲，用“七层宝塔”概括国语运动“从理想最高的主张到当时法令所明定者”，具体是指：一，以世界语为国语；二，汉语用罗马字拼音；三，注音字母独用；四，注音汉字书报之推行；五，新文学之提倡；六，小学改用语体文；七，国民一二年级先改。

的研究而言，既是了解关于“二潮合流”的史料，也是理论上探讨二者互动关系的先导。由于这些论者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提出这些见解的，强烈的历史使命使他们的认识带有浓厚的主观性，因此不全是客观的研究和学理的论述，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口号宣传和运动主张，这是我们在研究中需加辨析的。

现代文学和现代汉语建构的话题并没有随着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过去而成为历史。这个至今仍在讨论之中的话题在其后的时代里，沉淀了各种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就每种具体的观点而言，它总是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有着深刻的政治、历史、文化的原因，可能失之偏颇。但当它进入历史的论争，问题的思考随着角度的多元变得丰富起来。从30年代至今，关于文学和语言关系问题的思考，有三类视角。

第一类思考，以30年代大众语讨论和50年代文学语言讨论为代表，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两次讨论都批评“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学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语言，但着眼点不同，结论也不同。

30年代对文学革命和语言变革进行评述的代表人物是瞿秋白。在《论中国文学革命》和《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中，瞿秋白指出文学革命的意义“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他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①，并肯定文学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些观点看似与胡适的主张一脉相承，却正是瞿秋白批评新文学运动不彻底

^① 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年版，第11页。

的出发点。这种不彻底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实行“文学革命”必须进行“文腔革命”，而要彻底完成“文腔革命”必须进行“文字革命”，而文字革命的目标是“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所以新文学运动没有将“文字革命”进行到底；二是“文学革命”中的“文腔革命”充其量只是“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因为白话仅仅通行于“新文学”内，文言在其他领域还占据统治地位。因此，瞿秋白提出再来一次文学革命以建立真正的现代国语——“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语尾的、用罗马字母写的一种文字”^①。

50年代文学语言讨论以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对胡适白话主张的批判为代表，主要人物是周祖谟和魏建功。周祖谟认为胡适将文言称作“死文字”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因为他否认了语言的稳定性和承继性。而魏建功认为文字是可以改革的，语言不可以改革；文学语言可以吸收方言、俗语来丰富自己，但是它是不可以被“革命”的，因为它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具有极大的稳定性。他批评胡适将文字和语言混为一谈，错误地主张语言改革。^②此外，郭绍虞也于1959年发表《五四与文学语言》，认为文学革命由于混淆文学/文学语言、文体/表达文体的语言、文字/语言等概念而对文言进行了过分的否定，由于止于“文腔革命”而没有彻底完成思想革命的使命，由于将

① 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年版，第29页。

② 周祖谟：《从“文学语言”的概念论汉语的雅言、文言、古文等问题》，魏建功：《胡适“文学语言”观点批判》，见《文学语言问题讨论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

文学作为国语标准的制定者而忽视了大众。他将这些“错误”的观念概括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学语言观，并加以批判。^①

比较这两次讨论，虽然都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批评，但前者渴望“乘热打铁”地继续推进革命，后者则是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清算。不同的时代任务和理论方法使他们在具体理论问题上的见解有很大差异：1. 前者否定文言，认为白话对文言的吸收是“文学革命党”对保守派的妥协；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文言，并引用毛泽东的“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认为白话对文言的批判过头而继承不够。2. 前者认为“文学革命”、“文腔革命”（即语言革命）和“文字革命”是连动的过程，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文学革命领域的“文腔革命”；而后者否定“文腔革命”，也就否定了文学革命的成绩（因为胡适认为文学革命的目标和实绩只有一个就是语言革命）。两次讨论的结论虽然悬殊很大，综合这些意见，却有一些富于启发的见解：文学革命虽然主张废文言兴白话，但在国语的实际建设中却汲取了文言以及其他语言要素，这是语言自身发展规律使然；“文学革命——文腔革命——文字革命”的连动关系，揭示了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联合的必要性，其中“文腔革命”是两个运动的共同事业；文化领域的“革命”与政治领域的改朝换代的性质截然不同，它是一种继承性的改革，因此语言的变革必然有一定限度，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对语言变革限度的理解存在差异，导致

^① 郭绍虞：《五四与文学语言》，《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实践效果的差异。

第二类思考以 80 年代中期的文化语言学研究 and 90 年代初开始的重估“现代性”及汉语书面语的论争为代表。这两次讨论是在寻根文化和人文思潮影响下出现的以传统文化的重估和继承为特点的反思。文化语言学的核心人物是申小龙。他对《马氏文通》以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走向提出质疑：“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学没有自己的文化哲学，缺乏理论方法的文化认同，淡化本民族语言的文化价值，漠视本民族语言的文化功能，造成民族语文传统的文化断裂，那么，它还能用现代眼光来正确地解释传统，选择传统，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吗？”^① 因此他提出汉语研究的现代化应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据，而不是从西方的菩提树上摘下现成的果子。用这种理论反思近现代的语言变革中出现的白话文欧化倾向，他认为：“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人们既缺乏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全面深刻的反思，也无力认识西方文化的精髓，因此由语言的变迁而造成了文化的断层。”^② 这种反思旨在启发人们发现汉语的特性，在重视传统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的现代化。

类似申小龙的思考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已出现。只是这些观点最初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论据，因此即便后来出现学理上的阐释，在狂飙突进的时代也被排斥在主流思想以外。比如申小龙的老师张世禄先生在 30 年代初所写的《中国语的演化和文言白话

① 申小龙：《中国句型文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 513 页。

② 申小龙：《文化断层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变迁》，《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年版。